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7.01.009

# 海外华商网络、东道国制度环境对 中国 OFDI 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研究视角

陈初昇, 刘晓丹, 衣长军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 “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性战略,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础, 检验海外华商网络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 OFDI 影响, 运用 Hansen 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检验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 OFDI 东道国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 活跃的海外华商网络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 可以促进中国 OFDI; 海外华商网络在促进中国 OFDI 进程中会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水平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即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门槛效应, 随着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好转, 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论文提出中国企业 OFDI 应注重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 优化海外华商网络建设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海外华商网络; 制度环境; 面板门槛回归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 (2017) 01-0079-08

2013年9月和10月, 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 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2015年3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战略,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OFDI)可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升中国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与繁荣。然而“一带一路”战略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如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宗教文化差异大、投资风险高等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界对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其中海外华商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同时, 学者们对东道国制度质量与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然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却非常匮乏, 将海外华商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则更为鲜见。文章验证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弱制规避”和“强制寻求”现象; 创新性地将Hansen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收稿日期:** 2016-04-28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维距离、组织学习与新兴经济体跨国投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研究”(16YJC790003)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陈初昇, 女,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刘晓丹, 女,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 主要从事国际投资方向研究;

衣长军, 男,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投融资管理。

引入到海外华商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关系的研究中,并试图得到制度环境的门槛值,进而弥补以往采用交乘项或分组检验的不足,为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 一、文献回顾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 OFDI 会产生影响。东道国制度环境包括经济、法律等多个层面。Dunning (2006) 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对 OFDI 区位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Williamson (1985) 指出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可以营造一个安定有序的市场环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促进各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sup>②</sup>; Dunning (1993) 分析了影响 OFDI 区位选择的主要变量,发现同样条件下较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促进对外投资<sup>③</sup>; Witt 和 Lewin (2007) 通过研究,得出了“制度逃逸论”,即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滞后,当地企业在本国经营成本大于跨国经营,为了避免本国制度的束缚,在其成长早期便开始实施跨国经营<sup>④</sup>; Luo 等 (2010) 经过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不完备的制度质量如腐败、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制度高度不确定性等,都会使得企业开始寻求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以降低经营风险<sup>⑤</sup>; 邓明 (2012) 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东道国经济法制制度与我国 OFDI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者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sup>⑥</sup>。总的来说,完善的制度环境意味着东道国有序的市场秩序、透明的法律体系,跨国企业进行投资时,有效的财产保护措施、稳定的经营环境可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Peng 和 Luo (2000) 指出企业可以依靠网络和联盟来获得发展<sup>⑦</sup>。Hitt (2000) 的研究表明,一些新兴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需要依托某些非正式的市场关系获得外部资源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降低经营风险,如社会关系网络、民族优势等<sup>⑧</sup>。Dunning (2002) 将企业在东道国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称为关系资产<sup>⑨</sup>。Erdener 和 Shapiro (2005) 对中国 OFDI 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海外华人华侨网络越密集,中国企业对其投资时整合资源的能力就越强,经营风险就越小<sup>⑩</sup>。Wright 等 (2005) 也强调了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海外华商关系资源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也表明,相当一部分资本输出流入东南亚等海外华侨华人聚集区,如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根据国侨办最新数据,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逾 6000 万人,分布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社团网络逾 2.5 万个,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海外华商网络具有本土化、国际化

① Dunning J. H. 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y [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6, 15 (1): 173.

② Williamson O.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M].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85.

③ Dunning J. 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 Wokingham: Addison Wesley, 1993.

④ Witt M. A., Lewin A. Y.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Escape Response to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579 - 594.

⑤ Luo Y. D., Xue Q. Z., Han B. J.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 (1): 68 - 79.

⑥ 邓明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 OFDI 的区位分布》,《国际贸易问题》2012 年第 2 期。

⑦ Peng M. W.,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 - Macro Lin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3): 486 - 501.

⑧ Hitt M. A., Dacin M. T., Levitas E., Arregle J. L., Borza A. Partner Selection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Market Contexts: Resource - Based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3): 449 - 467.

⑨ Dunning J. H. Relational Assets,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J]. *Cooperative Strategies &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02: 569 - 594.

⑩ Erdener C., Shapiro D. 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amily Enterprises and Dunning's Eclectic MNE Paradigm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 (3): 411 - 436.

特征, 中国 OFDI 企业自然会嵌入到东道国海外华商网络之中。我们认为海外华商关系网络可能是影响 O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Hitt 等 (2000) 通过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 这些国家的企业往往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外部资源, 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Dunning (2002) 的研究也表明,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可以帮助中国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 甚至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sup>①</sup>。而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企业海外经营也有很大的影响, 东道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可以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一个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好,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便越完善, 企业经营环境也会更加规范, 这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Globerman 和 Shapiro (2003))<sup>②</sup>。基于此, 海外华商网络在影响中国 OFDI 的过程中, 东道国制度质量可能会对此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高度不确定性的东道国制度环境下中国跨国企业经营成本高、风险大, 此时良好的海外华商网络关系可能会有助于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减少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 即海外华商网络对 OFDI 促进效果凸显; 反之, 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投资与运营, 海外华商网络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减弱。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 文章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面板数据为样本, 首先检验了海外华商网络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 OFDI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 然后运用 Hansen 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研究东道国制度质量在海外华商网络影响 OFDI 进程中的门槛效应。文章创新之处: 第一, 基于“一带一路”研究视角, 将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华商网络、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变量放在同一体系进行研究, 深入考察了海外华商网络、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影响中国 OFDI 过程中的关系, 丰富了发展中国家 OFDI 理论; 第二, 文章创新性地运用 Hansen 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和华商网络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会因东道国制度环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作用, 并得出了制度环境的门槛特征值。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3 - 2012 年中国对 50 个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国家的投资额为样本, 其 OFDI 金额占当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 65.2%、74.5%、83.8%、89.4%、97.2%、95.4%、95.8%、93.7%、95.2%、98.5%, 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 (一) 被解释变量

借鉴何本芳 (2009) 的研究方法, 被解释变量 (OFDI) 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 的投资存量, 数据来源于 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sup>③</sup>。

### (二) 解释变量

1. 东道国制度环境 (INS), 参照 Buckley (2007) 的方法, 制度环境主要由全球治理指标报告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 简称 WGI) 中东道国政权稳定性 (Political Stability) 和法制水平 (Rule of Law) 来测定<sup>④</sup>。一国的政权越稳定吸引 OFDI 就会越多, 而法制水平反映了经济主体确信并遵守社

① Dunning J. H. . Relational Assets,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ctivities [J]. Cooperative Strategies &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002: 569 - 594.

② Globerman. S. D. , Shapiro,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1) : 19 - 39.

③ 何本芳, 张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探索》, 《财贸经济》2009 年第 2 期。

④ Buckley P J, Cross A R, Liu X, Voss H, Zheng P.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 499 - 518.

会秩序,尤其是合同实施的质量、财产权的保护和司法治理的质量,两者均与 OFDI 直接相关。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获得全部样本国家(地区)的制度环境综合指标得分。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

2. 海外华商网络(CHI),采用 Gao(2003)以及 Singer(2006)的方法,用各国华侨华人数量占该国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一国的华人华侨比例越大,该国的华商网络活动也会越活跃,潜在的关系资源也越丰富,我国企业对其 OFDI 可能性就越高。数据来源于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专项数据库,该数据库收集了中国在各国(地区)华侨华人人口数量,在海外华侨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三) 控制变量

1. 东道国市场规模(lnPGDP),以东道国的 GDP 来衡量,一般来说,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规模就会越大,我国企业对其 OFDI 可能性越大。数据来源于 IMF 数据库。

2. 双边贸易额(lnTRA),文章选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历年双边贸易总额来衡量,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越大,说明经济联系越紧密,投资额也会相应变化,因此两国的贸易量与 OFDI 也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我国市场规模(lnCGDP),国内生产总值可反映一定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实力及对外投资的潜在实力,数据来源于 IMF 数据库。

4. 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lnWAGE),采用东道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来衡量。学者普遍认为,相比较投资于国内市场或其他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市场而言,投资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市场,可能使企业更有机会获得高额利润。因此,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与我国企业对其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

5. 自然资源禀赋(RES),用东道国燃料、矿石和金属的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的百分比来表示。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优越,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

6. 东道国 GDP 增长率(GDPG),以此来衡量东道国市场的吸引力。一般来说,一国 GDP 的增长率越高,吸引力就越大,对其投资可能就越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7. 地理距离(lnDIST),地理距离是指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空间距离,一般来说,地理距离对投资具有负面影响,若两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变远,则两国(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不利于跨国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现有文献大都采用不变的地理距离,本文借鉴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的方法,用北京和各个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与国际油价的乘积来表示<sup>①</sup>,解决了距离成本不变的缺陷。北京和各个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国际油价来源于 IMF 数据库。

8. 贸易开放度(lnOPEN),贸易开放度衡量了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水平,本文以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总额的比重取对数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数据处理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东道国市场规模、我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劳动力成本均采用 2003 年的 CPI 指数进行了平减,同时为了减小数据异方差的影响,对 OFDI 存量、东道国市场规模、我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劳动力成本、地理距离以及贸易开放度进行对数处理,表 1 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sup>①</sup> 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投资的引力模型》,《世界经济》2011年第5期。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ln OFDI$	7.836	2.699	0	14.029
制度环境质量	$INS$	6.00 e - 08	1.000	- 2.602	2.358
海外华人网络	$CHI$	2.578	10.880	0	74.1
东道国市场规模	$\ln PGDP$	3.912	1.510	0.623	7.330
我国市场规模	$\ln CGDP$	8.104	0.448	7.409	8.756
双边贸易额	$\ln TRA$	12.232	1.939	6.475	15.788
劳动力成本	$\ln WAGE$	8.230	1.302	5.288	11.113
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	$RES$	20.789	25.209	0	99.897
东道国 GDP 增长率	$GDPG$	5.545	4.859	- 17.955	34.5
地理距离	$\ln DIST$	1.869	0.572	- 0.455	2.775
贸易开放度	$\ln OPEN$	3.637	0.935	- 1.698	5.439

###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 (一) 模型设定与估计

$$\ln OFDI_{it} = \beta_0 + \beta_1 INS_{it} + \beta_2 CHI_{it} + \beta_3 \ln PGDP_{it} + \beta_4 \ln CGDP_{it} + \beta_5 \ln TRA_{it} + \beta_6 \ln WAGE_{it} + \beta_7 RES_{it} + \beta_8 GDPG_{it} + \beta_9 \beta \ln DIST_{it} + \beta_{10} \ln OPE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分别代表不同的东道国(地区),  $t$  代表年份,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9$  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varepsilon_{it}$  是干扰项。

#### (二) 回归模型与结果

PCSE 模型是对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 是对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一种替代, 主要用于模型中存在异方差或自相关的情况, 可以提高面板数据回归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运用此模型前首先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结果

异方差检验结果	Likelihood - ratio test	LR chi2 ( 48) = 236.98
	Assumption: homo nested in hetero	Prob > chi2 = 0.0000
序列相关检验结果	H0: no first order auto correlation	F ( 1, 48) = 11.778
		Prob > F = 0.0012

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 即模型中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另外, 为了检验模型结果对计量方法的敏感性, 文章同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 PCSE、FGLS 回归,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种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模型回归的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限于篇幅, 本文仅以 PCSE 回归结果为例。

表 3 PCSE 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PCSE 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 PGDP$	- 0.096 (- 0.89)	- 0.060 (- 0.55)	0.006 (0.05)	0.028 (0.26)
$\ln CGDP$	1.596*** (6.16)	1.646*** (6.27)	1.613*** (6.49)	1.649*** (6.54)
$\ln TRA$	0.935*** (8.77)	0.915*** (8.47)	0.818*** (8.07)	0.807*** (7.89)
$\ln WAGE$	- 0.412*** (- 7.17)	- 0.554*** (- 12.90)	- 0.498*** (- 8.43)	- 0.597*** (- 13.36)
$RES$	0.009*** (3.83)	0.007*** (3.44)	0.008*** (3.69)	0.008*** (3.43)
$GDPG$	0.025* (1.70)	0.026* (1.78)	0.018 (1.22)	0.019 (1.31)

$\ln DIS$	-1.126***(-6.29)	-1.068***(-6.21)	-1.014***(-5.86)	-0.976***(-5.81)
$\ln OPEN$	-0.016(-0.15)	-0.014(-0.13)	-0.090(-0.80)	-0.086(-0.78)
$INS$		0.225*** (2.65)		0.163** (1.99)
$CHI$			0.038*** (10.21)	0.037*** (9.77)
$CONS$	-10.94***(-8.50)	-10.18***(-8.54)	-9.531***(-7.10)	-8.855***(-7.12)
$R^2$	0.555	0.559	0.574	0.575
$Wald\ chi^2$	1490.22	1624.70	1817.73	1809.09
$N$	489	489	489	489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和\*\*\*分别代表统计在10%、5%和1%上显著

模型1仅包括控制变量,表3的结果显示,我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地理距离与其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东道国市场规模、贸易开放度对其影响则不显著;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2增加了制度环境水平变量,结果显示其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即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明显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OFDI具有明显的“弱制规避”和“强制寻求”的动机;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海外华商网络,其系数也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活跃的华商网络可以促进我国对其OFDI,表明中国OFDI水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华商关系资源呈正相关,海外华商关系资源确实是我国企业OFDI决策时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模型4则加入了所有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模型1、2、3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更加稳健。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良好的海外华商网络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实证结论。前文所述海外华商网络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弥补外部市场机制的欠缺,获取外部资源,降低经营风险,那么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海外华商网络是否可以弥补东道国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呢?本文运用Hansen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对此进行检验。

### (三) 门槛效应分析

在研究某一变量通过影响另一变量进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时,通常采取分组检验或交乘项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分组检验时我们无法确定分组的准确值,而交乘项的方法只能测定解释变量或正或负地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情况,对具体门槛值则无法测定。而Hansen(1999)提出的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sup>①</sup>,克服了如上缺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门槛回归的优点:一是不需要给出非线性方程的形式,其门槛值和门槛数量由样本数据内生确定;二是可使用Bootstrap方法来检验门槛值在统计上是否显著。对海外华商网络在影响中国OFDI的过程中,是否会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水平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制度环境质量在什么区间内影响最大?其门槛特征值是多少?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ln OFDI = \beta_0 + \beta_1 \ln PGDP_{it} + \beta_2 \ln CGDP_{it} + \beta_3 \ln TRA_{it} + \beta_4 \ln WAGE_{it} + \beta_5 RES_{it} + \beta_6 GDPG_{it} + \beta_7 \ln DIST_{it} + \beta_8 \ln OPEN_{it} + \alpha_1 CHI_{it} I(INS_{it} \leq \gamma_1) + \alpha_2 CHI_{it} I(\gamma_1 < INS_{it} \leq \gamma_2) + \alpha_3 CHI_{it} I(INS_{it} \leq \gamma_2)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i$ 表示不同的东道国(地区), $t$ 表示时间, $\gamma_1$ 、 $\gamma_2$ 表示特定的门槛值。

文章利用Stata13对样本进行Hansen门槛估计检验,并利用自举法反复抽样100次后得出如下表4的检验结果。

<sup>①</sup> Hansen, B.,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345 - 368.

表4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门槛类型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CHI	INS	单一门槛	12.500**	0.030	18.907	11.628	8.868
		双重门槛	48.354***	0.000	3.787	1.468	0.790

门槛估计值以及对应的 95% 的置信区间见表 5, 结果显示, 制度环境的双重门槛估计值分别为: -1.622, 0.578, 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 门槛估计值与真实值一致。

表5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估计值	95% 置信区间
INS	-1.389	[-1.429, 1.654]
	0.494	[0.112, 0.578]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 制度质量的门槛作用确实存在。限于篇幅文章仅报告了双重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见表 6:

表6 制度质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ln PGDP$	0.222 (1.12)	$GDPG$	0.025 (1.38)
$\ln CGDP$	2.093*** (6.58)	$\ln OPEN$	0.155 (1.17)
$\ln TRA$	0.524*** (4.20)	$CHI (INS < -1.389)$	1.817*** (6.44)
$\ln WAGE$	-0.499*** (-3.88)	$CHI (-1.389 \leq INS < 0.494)$	0.964*** (6.81)
$RES$	0.020*** (4.77)	$CHI (INS \geq 0.494)$	0.022** (2.62)
$\ln DIS$	-1.267*** (-4.53)		
$R^2$	0.547	观测值	$INS < 0.494$ 336
$N$	500		$INS \geq 0.494$ 164

表 6 显示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 -1.389 时, 此时由于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差, 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本较高, 此时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减少海外投资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作用效果凸显, OFDI 影响系数为 1.817,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促进效果显著; 随着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的好转, 即在两个门槛值之间 ( $-1.389 \leq INS < 0.494$ ) 时, 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为 0.964, 其作用有所下降; 而随着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当其跨越第二个门槛值 ( $INS \geq 0.494$ ) 后, 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 OFDI 的影响系数弱化, 仅为 0.022。实证说明随着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 海外华商网络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 即对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时, 海外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减少风险和成本很有必要, 其促进作用更强。更进一步我们研究发现, 在文章研究的 500 个样本数据中, 有 336 个东道国制度环境在第二个门槛值 0.494 以下 (此时海外华商的作用较强), 占到了总样本的 67.2%, 说明海外华商网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 从表 6 中还可以看出, Hansen 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和 PCSE 模型表 3 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模型稳健性强。

####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 PCSE、FGLS 以及 Hansen 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分析了海外华商网络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 OFDI 的影响, 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对我国 OFDI

存在正向影响;第二,活跃的海外华商网络可以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且这种促进作用会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也就是说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在此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中国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地区)时,海外华商网络的促进作用更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东道国不完善的制度环境。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对我国 OFDI 存在正向影响,东南亚诸国制度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加大东南亚各国 OFDI,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共赢;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裔人口比例大,且当地的经济、文化条件等已经适宜大量的中国企业进入,中国企业可以加大对其投资,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至于西北一些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国家与地区,从门槛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海外华商网络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投资进入了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国家(地区),有较大的投资风险,虽然我们不能决定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但通过海外华商网络的作用,可以大大减少不确定性风险,促进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战略是海外华侨华人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聚居着大约 4000 万海外华侨华人,是海外华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海外华商网络最发达的地区,因此建议政府和企业要高度重视、拓展与建设海外华商网络,充分发挥海外华商网络价值,实现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海外华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特约编辑:李碧珍)

(上接第 78 页)

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以被动返乡的“生存式创业”为主,创业面临启动资金不足、经营经验欠缺、政策不熟悉等现实困难。<sup>①</sup>因此,支持制造业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要根据这一创业人群的具体特征和创业困难,从创业培训、资金扶持、“硬件”配套等方面入手,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降低其创业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 五、结论

中国制造 2025 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智能制造在新增大量高技能岗位需求的同时,将淘汰以生产装配为代表的大多数低技能劳动岗位。这对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结构提出了新要求,使大多数农业转移劳动力面临“机器换人”威胁。提前布局,妥善处置这部分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不仅关乎制造业顺利转型,还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政府、企业、教育系统、协会组织和农业转移劳动力个人等多方力量应该紧密合作,共同面对。

(特约编辑:李碧珍)

<sup>①</sup> 陈彬《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困境及对策》,《中国科技投资》2016年第11期。